

2022 年女學會年度研討會理事長演講

清消的政治： 疫情危機、遷移與性別

The Politics of Sanitization: Pandemic Crisis, Migration and Gender

演講、潤改 | 藍佩嘉 | 台灣女性學學會第 29 屆理事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整理 | 黃種賢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疫情在這幾年來席捲全球，疾病風險不僅帶來健康與公衛的危機，同時也形成社會的危機，影響我們周遭的社會生活與人際關係，原先穿梭國境之間的移工群體，這段時間面對著不同面向上更嚴苛的管制措施，包括邊界管控、移民治理，與日常生活中的汙名化。本文根據我跟香港城市大學 Yuk Wah Chan 教授合編於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31(3) 出版的專刊 (Chan & Lan, 2022)，我們以「清消的政治 (politics of sanitization)」作為分析的概念框架，探討疫情期間，國家的防疫治理對移工的生活造成的影響。這個概念架構涵括四個面向的分析：空間與邊界的清消、移工身體的汙名化、種族邊界與國家身體的清消，以及社會成員資

格的重組。

空間與邊界的清消 (sanitizing space and border)

疫情帶來的空間管理，最直接的就是國家邊界的管控，這些管控需要面對的是疫情帶來「陣發的脆弱性 (sporadic precarity)」，即瞬息萬變又難以預測的疫情，使染疫風險呈現斷斷續續、不確定且易變化的樣貌。隨之而來突發性的國家邊界封閉等管控措施，讓人們快速的被迫離開，或被迫無法離開，也就是項飆所說的 shock (im)mobilities (Xiang & Sørensen, 2020)。

在臺灣，國家在疫情期間幾乎是採納封閉國界的政策，除了少數例



圖 1: 藍佩嘉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以視訊方式發表演講。

外狀態如國際學生、外交人員，或持有 ARC 居留證 (Alien Residence Certificate) 者，其餘外國人都無法入境臺灣。當時雖然允許移工在持有工作證的條件下進入國門，然而各國大使館在這段時間都停止發放簽證，使得移工無法實際跨國移動。在此同時，各個移出國也開始關閉國界，限制本國人民的向外移動。此外，疫情造成全球航空業的機票大漲，或是需要更繁瑣的轉乘路線，都造成跨國移動成本的大幅上升，變相增加移工的遷移困境。雙邊的邊界管控與增加的成本門檻，形成許多移工「非自願性不移動 (involuntary immobility)」的困境，他們在主觀

上存有移動的意願，卻因為前述結構因素無法遷移。

疫情期間，新的邊界管理技術與形式也隨之出現。大家耳熟能詳的旅遊泡泡 (travel bubbles)、防疫通道 (corona corridors)，都是疫情成為新常態下例外性的空間創造，並為這些新形式空間治理打造新的視覺想像。此外，防疫旅館的入境隔離政策，也是國家試圖創造一種特殊的時空監禁狀態，期待外來的疫病風險會在此種隔離的時空中獲得暫時性的緩解，搭配電子手環、手機定位等電子圍籬的科技物輔助，使得國家能進一步確保邊界監控的效果。

移工身體的汙名化 (stigmatization and sanitizing migrants' body)

早在疫情發生前，移工來臺前後都需要進行身體檢查，顯示對於移工身體的清消與管控始終存在，疫情更強化了對移工身體的監控。舉例來說，各國對 FDWs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外籍幫傭 / 外籍監護工) 的身體皆有進一步強化監控的手段：在香港，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間，FDWs 被強制要求進行新冠病毒的檢測；在新加坡，FDWs 不被鼓勵休假，甚至被要求待在雇主家中，政府並在高風險時期於移工放假時的聚集處，執行新冠檢測、確保社交距離的維持。

為了防疫，我們都有回到家門先清潔雙手、換洗衣物，甚至在家中四處噴酒精消毒等，也就是微觀層次上的家庭空間清消 (sanitizing home space) 作法。Chan 與 Piper (2022)

的香港研究指出，在僱傭 FDWs 的家庭中，這些家庭空間的清消工作一方面落在 FDWs 肩上，另一方面他們卻經常被認為是風險來源本身。於是，雇主對 FDWs 施予各式的限制性控管，除了外出、放假等移動控制，這些管控也存在於家戶之內，如要求 FDWs 不能接近較脆弱的小孩或老人。

移工會在他入眼中成為高風險的來源，部分原因來自人們想像移工休假外出時，參與大規模的社交活動，從而可能高度曝險在疫病風險中。然而，新冠肺炎的感染風險其實隨機散布於各種類型、大小的活動之中，對於移工社交生活的狹隘想像造就這樣的風險評估，如香港的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 受訪時，以「好像傳染只會發生在星期天」來突顯荒謬之處 (Chan & Piper, 2022)。而香港的例子最不幸之處，是許多 FDWs 染疫時被雇主遣



棄，雇主不容許移工在家隔離，她們被迫離「家」、尋求 NGO 的收容。

除了 FDWs，工廠移工也因為居住環境擁擠等原因，被視作高風險群體。以新加坡的統計資料看來，居住於大型宿舍的外籍移工，確實有著較高的感染可能，但這並非基於移工的族群或公民身份，而是肇因於居住空間與工作環境的條件。臺灣在三級警戒期間，苗栗被隔離或禁足的工廠移工，便在臉書（Facebook）上張貼不少照片來抗議其工作與生活空間太過擁擠或侷促，難以維持社交距離。

種族邊界與國家身體的清消 （sanitizing ethnic borders and the national body）

除了移工，「外國人」作為一個更大的集體，也可能面臨監管、控制與汙名化。根據種族邊界劃分的清消政治分野，將本國居民想像為乾淨且

健康的我群，外國人則會被視為不潔，帶有潛在的疫病風險。

我們的專刊中有一篇論文探討日本以種族界線作為清消界線的具體例子（Vogt & Qin, 2022）。臺灣媒體很常以「佛系防疫」來形容日本的防疫政策，相比臺灣等其他國家，日本政府較少使用懲罰、禁止性的強制政策來進行防疫治理，而是強調自肅（じしゆく）的作用。藉由個人對己身行為與活動的自律與守序，可以在國家不強制介入的前提下達到某種程度的有效防疫。

然而，這種自肅的能力與秉性，經常被連結到關於種族特性的想像：預設日本人有能力或習慣好好遵守規矩，而外國人沒有這樣的自律能力，導致較高的染疫風險。當時日本的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假消息，例如謠傳日本的病例有一半以上是外國人造成。當日裔巴西小孩就讀的學校爆發新一波疫情時，日本家長要求巴西孩童不得與自己的孩子同桌吃飯；日本的部分保健中心發出指引，提醒日本居民不要與外國人一同用餐，認為外國人不愛洗手、不戴口罩等個人防疫舉措不當；甚至有當地的餐廳與髮廊，明確貼出告示說僅服務日本人，這些例子再再彰顯種族想像如何形塑並區隔日本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清消邊界。

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可見到，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也會循種族界線特別標記出某些群體：中國人、華人，或是更廣義的亞洲人，依著同樣的邏輯被看作疾病的帶原者，成為當地居民眼中全球疫情蔓延的代罪羔羊。

社會成員資格的重組 (reorganizing the borders of sanitization & social membership)

清消政治的第四個面向，是清消政策可能帶來社會成員資格的重新組織，有別於前面的討論聚焦在移工處境如何於疫情中更為艱困，社會成員的納入可能帶來對移工相對正面的影響。原因在於，一個國家要達成有效的公衛治理，需要網羅社會中的所有成員，而不能將非公民身份的特定群體區分並排除在公衛體系之外，從而達成整體性的清消 (sanitary whole)。

隨著疫情的開展，大部分的國家皆提供外籍移工關於新冠疫苗的接種、確診後治療等醫療的近用權利，不會區分本國或外籍，或是有證及無證移工。在南韓與香港，很早就開始為無證移工提供疫苗接種計畫，以及免費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聚合酶鏈鎖反應) 檢測，以納入、而非排

除等較為正面的政策來維持整體的清消效果。Triandafyllidou (2022) 提出「居住身份權利 (effective membership / the right of abode)」的概念，指出這段時間移工等非公民群體，某種程度上取得以居住為基礎的身份權利，他們作為居民可受到一定程度的權利保障。但在公衛與醫療的福利之外，他們多數時候仍然被排除於補貼政策之外，例如其他具公民身份者可以請領的失業補助、紓困津貼等經濟面補貼。

臺灣的案例 (Lan, 2022) 也顯現對於無證移工的防疫政策方向的逐步轉變。2020 年 2 月的疫情初期，無證照護移工的確診案例，剛開始引發社會對無證移工疫病風險的焦慮與敵視，有些地方政府以圍堵「防疫破口」之名，執行大規模掃蕩政策。同年 4 月，移民署進行「失聯移工擴大自行到案專案」，以不收容、不管制、低罰緩為準則，期待無證移工自行「投案」，使之納入可管控的風險之中，然而政策執行下隔離安置空間的不足、無證移工搭機回國管道有限等收容困難下，政策效果並不彰。2021 年 5 月，政策進一步放寬為「外籍人士安心採檢專案計畫」，強調不收費、不通報與不查處的原則，不論有證與否皆可近用醫療服務的權利。最大的轉變發生在 2021 年 12 月的「逾期停 (居) 留外來人口安心接種

工廠開始願意招募缺乏相關經驗或技能的監護工進行轉換。由於工廠的薪資、休假與自由移動權利等勞動條件都更為優越，許多監護工積極爭取轉換到工廠，如圖 3 所顯示，在 2021 年上半年確實有明顯的增加，其中又以較年輕的菲律賓女性，更有機會爭取到相關的流動機會。不過跨業別轉換在三級警戒期間被禁止，勞動部更在之後頒布規定大幅限縮了可能性。

即便是過去被仲介描繪為「聽話、順從」的印尼移工，也在疫情期間，取得更多的議價籌碼。由於市場供需狀況的轉變、跨行業轉換的機會增加，

照護工得以取得更多的協商能力與空間，向雇主爭取更好的薪資回報等勞動條件。

這些疫情帶來的勞動市場流動機會與協商條件的改變，其實鑲嵌在更長期的國際勞動市場狀況之中。早在疫情開始前，跨國移工的勞動市場即已顯現買方市場轉往賣方市場的趨勢，早年由移入國仲介收取的高額仲介規費等情形，在近幾年都開始調降仲介費用，甚至以臺灣為例，臺灣端在尋找跨國勞動力的單位，需要先支付「買工費」，臺灣仲介才會開始去國外尋找工人，這都與 2000 年代跨國

110 年外籍家庭看護工轉換至製造業之各月人數統計



圖 3：外籍監護工轉換到製造業的人數統計。資料來源：勞動部未公布統計，由洪申翰立委辦公室提供。

勞動市場運作時的光景完全有別。於是，疫情對供給端的限縮，加速促成此一進程，國內半導體製造業等需求端的標準降低，提供更多的職涯流動可能性，移工也如同前面所述樂於轉換工作類型，並回過頭強化照護工的協商籌碼。

被迫（不）移動的性別差異 (gender difference in shock (im) mobilities)

最後，讓我聚焦性別的軸線，討論疫情對不同性別的移工造成有差異的影響。首先，勞動遷移職業分布的性別化，讓男性、女性移工在疫情期間面對不一樣的條件、議題與後果。以菲律賓為例，疫情期間許多男性移工被遣返，或是強迫性的要求他們返國，原因在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多半不被視為必要性勞動（essential work），這些受迫回到母國的男性移工，會試圖尋求再次跨國遷移的機會，以重新找回、宣稱自己被迫回國時受損的男子氣概。相較之下，女性移工的處境則完全不同，他們多是必要勞動者，或屬於護理師等所謂前線勞工（frontline workers），時常是作為對抗疫情的第一線成員。

疫情帶來全球的公衛危機，染疫人數的暴發加重醫療體系的負擔，

考驗醫療量能的酬載能力，更是讓第一線的護理人員面對更嚴苛、高風險的職場環境。以美國為例，疫情期間，就有 20% 的醫療人員選擇離開職場，肇因於醫療過程的高度壓力、保護設備不足的風險，以及最直接的傷害，也就是治療過程被感染後的死亡風險，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資料即指出，已有超過 18,000 位的醫療人員死於新冠肺炎之中。因此，醫療體系的人員缺口，使許多國家開始向國外招聘相關人員，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會員國中，有 16% 的護理師就來自於境外移工，各國藉由向國外開缺，以及調整並肯認外國醫療證照等各式政策，試圖緩解國內醫療體系的壓力。

另一方面，作為移出國的國家，在這段時間同樣不希望國內的醫療從業者向外國流動。同樣以菲律賓為例，2020 年 4 月開始，菲律賓祭出暫緩醫療照護工作者出國的限制，希望將醫療人員留在本國，這項政策後來調整為總量管制，明定每年跨國的醫療移工人數上限為 5,000 人。同時，國家的論述開始將護理師形容為「士兵」，以疫情作為戰爭的隱喻，賦予並要求護理師留任國內的抗疫責任。

有些女性移工被迫困在家裡，也有些移民女性受疫情所限而無法返家。這群想要返家的女性，在國界封閉與旅行限制的情況下，無法順利返回母國。尤其當母國的家人染疫生病時，自己無法及時在身邊提供照顧，照護的道德責任（moral responsibility）或缺席的道德罪惡感（moral guilt），成為這些困在海外的移民女性們的心理重擔。Kempny（2023）針對波蘭移民女性的研究，就描繪出一群困在國外的移民女性，如何試圖穿梭歐洲大陸返家，返家的路途過程存在巨大的危險與挑戰。

結論：清消政治的持續與永續政策的未來

短期來看，疫情的結束尚未到來，國家的公衛治理與清消的政治還會持續下去，藉由對清消政治的分析，我們看見移工群體的處境如何在國界封閉下改變，成為一群被嚴加監管、控制與汙名的他者，並被種族化的劃界過程賦予對他者的偏見，然而同樣的，有效公衛治理的整體性的要求，也帶來社會成員資格重組的契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改變既有跨國遷移勞動市場的不平等與協商權力。

在結論中，我想簡要指出三個需要反思的方向。首先，國家在疫情期間的

公衛治理，反映了國家權力愈發明顯、增強的趨勢，以防疫為名，或是由公衛體系執行的強制性政策，是這個著重清消時期的重要特徵，如此的國家權力運作，是否會進一步的發展為以健康為名的安全化（health securitization）過程，例如中國這樣的典型例子，可以是後續觀察的重點。其次，臺灣社會需要重新思考移工政策的永續性。疫情彰顯出臺灣缺（移）工的緊迫問題，我們長期依賴全球照顧鏈（global care chains）來外包公共的照顧責任，未來如何重新思索、改造移工與長照政策，能夠永續發展、並兼顧人權倫理，將是未來的重要挑戰。最後，防疫的清消政治，確實仍帶來烏雲邊的一絲金光，「同島一命」的疾病共同體論述，在疫病的威脅下不得不將移工納入公衛體制的有效治理，這使臺灣社會有機會承認並反思，移工作為必要勞動者，提供日常生活運作不可或缺的穩固基礎，他們值得被看作、接納為社會成員的一部分。

致謝詞：作者感謝王昱文、黃妤婷的訪談協力，以及科技部「照護移工的東亞比較」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002-196-MY3）。





參考文獻

- Chan, Yuk Wah, & Lan, Pei-Chia (2022). The politics of sanitization: Pandemic crisi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sia-Pacific.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31(3), 205-224. <https://doi.org/10.1177/01171968221129382>
- Chan, Yuk Wah, & Piper, Nicola (2022). Sanitized boundaries, sanitized homes: COVID-19 and the sporadic hyper-precarity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31(3), 270-291. <https://doi.org/10.1177/01171968221124346>
- Kempny, Marta (2023). COVID-19, (im)mobilities and blockages: Re-thinking mobilities of migrant women in Northern Ireland. *Global Networks*, 23(1), 75-89. <https://doi.org/10.1111/glob.12395>
- Lan, Pei-Chia (2022). Shifting borders and migrant workers' im/mobility: The case of Taiwa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31(3), 225-246. <https://doi.org/10.1177/01171968221127495>
- Triandafyllidou, Anna (2022). Spaces of solidarity and spaces of exception: Migration and membership during pandemic times. In Anna Triandafyllidou (Ed), *Migration and pandemics: Spaces of solidarity and spaces of exception* (pp. 3-22).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81210-2_1
- Vogt, Gabriele, & Qin, Sian (2022). Sanitizing the national body: COVID-19 and the revival of Japan's "Closed Country" strategy.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31(3), 247-269. <https://doi.org/10.1177/01171968221125482>
- Xiang, Biao, & Sørensen, Ninna Nyberg (2020, August 13). *Shock mobility: Long-term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lock-down*.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pure.diis.dk/ws/files/3591092/Shock_Mobility_laast.pdf